

铃兰



尽管来天坛不知多少次，但很多事还是不清楚，甚至根本不知道。

丁香花刚谢，居然还有那样多的人，蹲在丁香大道的两边，拿着手机，甚至举着单反相机的大镜头，静心屏气，纷纷在拍照。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很有些好奇。我走过去，看这些人究竟在拍什么？丁香树下种着的是玉簪，还远不到开花的时候，只有肥硕的叶子密密实实铺展展覆盖地面。正午的阳光直射下来，一片绿叶被晒得有些发杳，颜色发灰，这些人却兴致勃勃，有的人脸上渗出了汗珠。

我也躬下身来，看到他们拨开玉簪的叶子，下面露出一串串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地散落，像是蹦蹦跳跳地来到这里，故意分别躲藏着，和人们玩捉迷藏的游戏。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小白花。花小的，倒是见过不少，米兰比它们还小，丁香和槐花也不大，尽管米兰、丁香和槐花都是白色，但都没有它们这样白得晶莹。大概是得益于有玉簪叶子的保护，它们不受阳光的照射和风沙的侵袭，如足不出户的小家碧玉一般，面容白皙如玉，露珠般清透温润。

我问身边用手机拍照的一位年轻姑娘：“这是什么花呀，这么好看？”

她瞥了我一眼，口里吐出两个字：“铃兰！”那语气多少有些轻蔑，觉得我有眼不识金镶玉，连铃兰都不认识！

据说现在天坛里大小花卉有150种之多，这么多种花，我认识得不多，铃兰，更是第一次见。我确实有些少见多怪，禁不住说了句：“铃兰这么小！”

铃兰的名字，是听说过的。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常出现，说它们圣洁，夸张地说是圣母的化身。叶赛宁的诗里，把它和初雪相比拟，说——“我踏着初雪信步前行，心潮迸涌如初绽的铃兰。”

在我自以为是的想象中，铃兰的花不应该这样小，纤细得弱不禁风。心潮迸涌，如初绽的铃兰，也不应该这样漫不经心地散落，小心翼翼地躲藏。

我也蹲下来，不禁仔细观看。白是真的白如初雪，一串串垂挂下来，真的像是一串串袖珍版的风铃。只是没有想到它这么样的小，小得比童话里的七个小矮人还小。

铃兰那样的小，又藏在玉簪叶下，不愿意抛头露面，自然不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让我这样粗心大意的人，不知多少次路过这里，和它们擦肩而过，即使相逢也不相识。

在丁香道东，一步之遥，柏树林中的二月兰，开得疯了似的，紫莹莹、铺展展一片，汪洋恣肆，显山露水，仿佛这个春天的天坛，都是它们主宰的天下。

铃兰，如同闹市中的隐士一般，只愿意藏在这里，等待着有情人、有心人，或有心人，和它们相会。

只是我们不管它们乐意不乐意，就把它们请出，搬到热热闹闹的抖音视频上，发在朋友圈的九宫格里。

百花亭前的甬道两旁，西府海棠花开得正艳。星期天的上午，来看花拍照的人很多，海棠花下的长椅上坐满了人。

我坐在那儿画画，一个小伙子坐在我旁边等人。我们两人都坐那儿很久了。我画得很慢，小伙子等的人一直没来。我不着急，小伙子有点心急。

看样子，小伙子30岁出头，面容白净，长得挺英俊的，穿着件猎装式夹克，精精神神，利利索索。我们两人在一起坐得时间久了，便没话找话，闲聊了起来。我知道他在等他的女朋友，准确地说，是前女友。

“我们两人当年认识不到1个月，新冠疫情突然就来了。”小伙子告诉我。开始，两人通过手机联系，他还给她快递过口罩。后来，时间一长，两人的联系，不知什么时候就由淡变断了，就像一条小沟沟，本来水流得就不多，干涸了，好像是自然而然的。

“连手都没拉过一次。”小伙子尴尬地对我说。

是啊，时间是爱情的培养基，也是爱情的杀手。如果认识的时间长还好说，认识才1个月，时间一长，刚结识的那一点感情，容易让本来就不浓的茶水变得淡而无味，甚至蒸发干净。感情是一种依托在时间里的物质，随着时间的坍塌，感情便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最近，家里一直不断地给他介绍对

◎ 人世間

天坛花影

肖复兴



象，他都不满意，他自己明白，心里还有这个姑娘的影子。走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坐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他觉得很多姑娘长得都有些像她。其实，他认识她的时间那么短，但感情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不以时间论短长，即使说不上是一见钟情，她留给自己的印象也是蛮好的。

小伙子给姑娘打了个电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蓄谋已久，就想打个电话，想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缘分。打电话前，他心里也犯嘀咕，毕竟已经过去四五年，人家还能记得自己吗？而且，这么久了，你没个对象，人家就也得一直坚守阵地似的等着你？没准儿人家早有了对象，甚至都结婚了呢。再说，这么久了，她的手机号换没换呢？

不过，小伙子还是给姑娘打了个电话。电话铃响了半天，没有人接。也许，姑娘看见了是自己的手机号，不愿接吧。小伙子有些失望，不过，心想也很正常。四五年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也死了死灰复燃的这份心，心里嘲笑自己刻舟求剑，这么多年，河水早流走老远，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呢。

谁想中午吃饭的时候，姑娘打回了电话。“上午一直在开会，不好意思，没法接电话。”姑娘抱歉地对他说。电话接通了，心就接通了，断了线的风筝，就又飞回来了。似乎，姑娘一直在等他的电话，等来了电话，就好像等来了人。这几年来，姑娘的生活轨迹和他一样，感情也还是一片空白，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跌宕起伏，心机四伏。

电话中，他们几乎不约而同约好见面。约好了就在天坛这里的西府海棠花下重逢，花为媒，讨个好彩头。

可是，姑娘迟迟未到，难怪小伙子有些心急。

我劝小伙子：“也许路上堵车，星期天到天坛看花的人多。”

小伙子也这样认为，安慰自己。

西府海棠树丛中，看花的，拍照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也有不少年轻的情侣，嘻嘻笑笑，缤纷来往，花影扶疏，

是这个季节最美的时候。

突然，小伙子弹簧似的，从椅子上跳起，对我说了句：“来了！”便向前跑了过去。我很替他高兴，多年后的重逢，兴奋之情可以理解。

不一会儿，小伙子一个人快快乐地回来了，有些扫兴，对我说：“看错人了，不是她！”

我开玩笑揶揄他：“你是不是记不清人家的模样了呀？”

“不会，怎么会呢！”他肯定地说，一屁股坐在我身边，沉默下来，半天不说话。

我画完了，准备回家，站起身来，对他说：“她肯定是有事耽搁了，不会不来的。”

小伙子点点头。

“好饭不怕晚！”我又对他说。

他笑了。快到中午的暖阳轻风中，海棠花影，在他的脸上一闪一闪，萤火虫似的跳动。

紫荆



人说今夜大风，有十多级，多年少见。我和老伴赶在风前，趁上午去天坛看花，怕一夜大风，花落不知多少。梨花如雪，二月兰满地，紫藤花初放，西府海棠落英缤纷，百花亭前后几株粗大的紫荆，花开炽烈如火，格外照眼。

我对老伴说：“去紫荆那边照张相。”

来到一株紫荆前，紫荆花冠如伞，撑开一片紫红色花荫，阳光下，斑斑点点在微风中抖动。我刚要给老伴照相。身边的一个女人对老伴说：“您再往紫荆花下面站站！”她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伸出手摆弄着老伴的衣襟和围巾，并指点着她的站姿。那劲头儿很像以前照相馆里的摄影师，拍照前对被拍照的人一通热情而负责任地忙活。

然后，她又走到我身边，看看我的手机屏幕，对我说镜头的角度再放低一点，紫荆和人都会照得更全。最后，她伸出手臂，朝着老伴叫了声：“笑一点儿，好！”说着，她把手臂往下一挥，像摄影师按下快门前最后的指挥，我适时按下了快门。

“怎么样？照得不错吧？”她俯下身来，看手机上刚拍下的照片。果真不错。我夸奖并谢了她，又对她说：“您帮我们两人拍一张吧。”她很高兴地接过手机，又开始忙活，不住指点着我们的站姿，不断调整着她手机镜头的角度，最后，她蹲下身来，一连拍下几张我们和紫荆的全景。温暖阳光下，紫荆映红了 we 彼此的脸庞。

她的热情、认真和专业，让我感动。我注意观察了她一下，她身穿一件深紫色的长款风衣，斜挎一个精致的小挎包，足蹬一双矮跟系带黑皮鞋。一个很精瘦、很精神、很精悍的小老太太。

我对她说：“我也给您拍一张吧！”

“不用，我有自拍架！”她拍拍她的挎包，笑着对我说。

“看您身体多好啊！年龄也不大呢，多精神呀！”

“岁数还不大呢，今年都71岁了！”她笑着说。

我对她说：“看不出，以为您也就60多岁。”又问她，“怎么就您一个人来天坛看花呀，没带个伴儿？”

“老伴都走了6年了！”她这样说着，依然微微笑着。

“一个人，真不容易！看您这么乐天！”

“不乐天，又能怎么样？我老伴病了好几年，是我‘伺候’他走的。现在一个人，比以前轻松了好多！”

乐天派的人，一般爱说，不愿意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愿意倾吐出来，心里便不会系死疙瘩。所经历的一切苦楚和艰辛，再咸再涩如颗粒粗大的盐粒，便也被水化解开，融化掉了。

她告诉我，她有一个女儿，今年44岁，外孙子都18了，从小都是婆家管，用不着她操心。现在，唯一让她操心点心的，是她弟弟，家里就他们姐弟俩，从小相依为命长大。这阵子，她弟弟全家去外地旅游了，她得给弟弟看家一个多月。弟弟家在立水桥，她是一清早坐地铁五号线，先到天坛转转，然后回自己家看看窗户关没关严，预防今天夜里的大风，再回立水桥。

我问她的家在哪儿，离天坛远不远？她说很近，就在原来的天坛医院边上。我说您今儿是从天坛东门进，待会儿从西门出，这一趟把天坛都转遍了！她听后笑了：“不给我弟弟看家，我天天来天坛转！不转转，还难受呢！”我对她说：“看您多好啊，家住在天坛边上，天坛成您家的后花园了！”她呵呵笑得很开心。

分手前，我对她说：“今儿这一趟，您是从北城到南城，横穿了北京城。您多保重！”

她客气地谢过后，转身走了。紫荆的一片花影，淹没了她深紫色的身影。

一

两年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女士联系我，她希望将东亚图书馆打造成美国境内收藏海外华文书籍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并邀请我组织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向该馆捐赠会员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一倡议令我深受触动。我们协会的几位会员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UCLA，完成了首批捐赠。那天，陈馆长带领我们参观了馆藏。她嘱托我们华文作家日后多多利用该馆资源，同时也鼓励我们继续创作、持续捐赠。

那是我第一次踏入东亚图书馆，走在一排排书架之间，看到那些井然陈列着的各类华文书籍、方志、地方志、年鉴，我不禁惊叹。原以为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里以英文藏书为主，没想到竟然能见到如此全面系统的华文史料。更让我意外的是，在湖南省衡南县县志那一卷中，我竟然找到了我父亲的名字和相关记录。那一刻，我心中激动万分，回家后便迫不及待地与妻子分享，又把这条信息传回给国内的家人，亲人们听后无不激动，惊喜交加。他们也没有想到，祖辈的资讯竟在海外大学的图书馆里被发现。

那时，我刚好退休，由于美国亚裔社区处境的变化，令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我开始主编家族文集《寻根——我们的共同回忆》，也动笔撰写自传《风雨兼程》，希望通过这些文字，给后代留下一些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线索与记忆。

我自费印制了文集，并将这两部纪实文集以及我和妻子合著的几部长篇小说一起，打包寄往UCLA东亚图书馆。不久，陈馆长发来捐赠感谢信。当我把信件转发给国内亲属，尤其是那些曾参与家族口述和资料撰写的亲人时，他们被深深触动。有人含泪说，我替整个家族做了一件有分量、有意义的事情。那份来自海外名校的正式收藏证明，仿佛为他们的生命经历作了一份庄严注解。

我没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这种由文化认同、家庭荣誉与时代记忆共同编织出的情感，让我萌生了一个更宏大的想法：若能组织北美华文

◎ 零时差

美国捐书记

黄宗之（美国）

二

我首先联系了UCLA东亚图书馆，然而对方表示，加州大学系统内部有规定：一所学校已收藏的书籍将通过系统共享，其他学校不再重复收藏。这使我意识到，要真正拓展华人文献的影响力，必须将捐赠对象扩大至私立大学——那些资源雄厚、学术活跃、同时又拥有专精东亚研究团队的名校。

于是，我开始联系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布朗、斯坦福等东西海岸的知名高校东亚图书馆，通过写信、请朋友引荐，甚至在不同研究社群中寻找联系人。最初，大多数邮件石沉大海。所幸，一些热心学者帮我转发邮件，经过一番周折后，终于收到3所名校的积极回应：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均表示愿意接受华文作品捐赠。

我立刻将自己撰写的纪实文集、小说以及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协30周年纪念文集寄出，作为首批探路之作。让我意外又感动的是，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马小鹤主任不亲自回信，还附上了捐赠收藏证书。2025年初春，我决定正式启动捐赠3所图书馆的征集行动。考虑到若让作家各自寄书，难以管控内容与质量，甚至可能给图书馆造成压力，我建议由我统一收集、筛选、汇总，再按不同图书馆的馆藏需求分批邮寄。这一方案获得图书馆的认可。

我将证书消息发布在洛杉矶华文作协与北美华人作协的群组中。不到两个星期，就有近50位北美作家热烈响应，纷纷通过微信发送填写完整的书单资料。我按要求整理汇总，发给3所图书馆。几天后，馆方分别返回了各自愿意接受的书目清单，并标记出希望收藏的作品。捐赠工作由此顺利启动。

三

为了赶上第一批捐书，不少作家为了寄书，花费十几甚至上百美元，把书寄到我家。跨国邮寄费用昂贵，从加拿大寄书过来，国际邮费很高，可为了把书收藏到世界知名大学的图书馆，作家们深知其重要意义，他们的热情深深打动了我。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邮寄书籍遇到了麻烦，不断有作家发来微信，告知他们在当

地邮局寄书时，办事人员无法找到我家准确地址。我家的住址是Alta St.，邮局工作人员只能够打印出Alice St.，几位作家的书已经被邮局按照打印的错误标签寄出。这个地址与我家在同一个城市，用同一个区号，但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他们的书。有一位作者很着急，她手中已经没有几本书了，丢失了非常可惜。她发来邮寄收据、追踪号码，我跑去邮局查询，工作人员告诉我已经送至Alice街的住户。我跑到Alice街，在街口的一户住户门前敲门，窗口探出头来的是一位白人，这些年，我所居住的地区不太安全，持枪抢劫事件发生过好几次，我很担心被误解。白人家门也没有开，只是说他们没有收到。我只好在第二天找住在同一个城市英文流利的朋友再去这家敲门，结果仍旧是回复没有收到。无奈之下，我接连几天在家门口守着，等待邮递员，询问是否有收到包裹，送到了打印错误的地址。又在邮箱上写上一封信，请邮递员看到打印错误地址的包裹，帮忙投递到正确地址。等了3位邮递员，有人说确有这么回事，询问是否知道该投往何处，就把包裹退回去了。可寄件人在当地邮局查询，并没有退件。

连续有三四个作家邮寄的书丢失了。我心情格外沉重。妻子极为担忧，为我把一件本让大家高兴的事情办砸，造成不该出的问题。我也很难过，原本简单的事情出现意料不到的岔子，让满腔热情邮寄作品的作家们多么失望。没有办法，我需解决这一难题，几次跑去邮局，找到不同班次的负责经理，请他们帮忙解决。

日子一天天过去，遗失的作品没有消息。我只再跑去Alice街。那天，靠街里面的一户人家车库门开着，一位华人女士刚好在家门口。我向她讲述了邮局错投包裹之事，她说，她家收到一个纸箱，不知是不是我在寻找的。搬出纸箱一看，上面写着作家陈瑞琳的名字。我立刻打开纸箱，见到里面附着的纸条，包括寄来哪些书籍，其中有些书已经绝版了，有的书是最后一本。我吓得一身汗，不敢想象，假如这箱书丢了，我怎么向她交代。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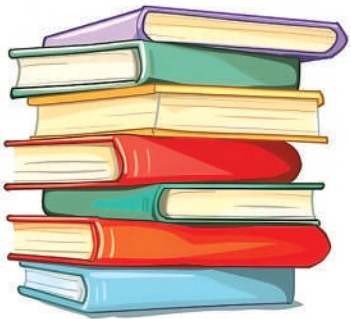
4月底，我按照哈佛大学选择的70多部

作品装箱，邮寄给哈佛大学。5月1日，我一位挚友的女儿结婚，婚礼在斯坦福大学附近举行。5月2日，朋友开车载着我们，带着50多部书去了斯坦福大学。但没想到，斯坦福大学居然有20多家图书馆，我们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东亚图书馆。负责接受捐书的昭慧老师没有上班，我们把书留给了当班的馆员。

第二天，我接到昭慧老师的电话，她特地向我致谢，并解释斯坦福大学无法给捐赠作家寄送感谢信的原因，因为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接受捐赠图书，需由总馆长签署，并与捐赠者签订合约。她承诺把合约发给我，如果可能将尽量满足作家们的要求。

她在电话中聊到捐赠华文作品目前遇到的问题，大学图书馆经费越来越困难，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少，能够获得的资源非常有限，她非常感谢海外作家能够提供作品，帮助图书馆收集这些宝贵的资源，提供给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做研究。我也谈到海外作家收集作品的初衷和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后，数百万华人移居海外，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海外华人作家作为亲历者，参与和见证了这一段历史，他们把这段历史用各种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更为海外华人后代留下祖辈们移居异国他乡的足迹。当有一天，他们想要寻根的时候，能够在美国最好的图书馆里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

也就在5月6日，那位华文作家丢失作品刚好整整1个月，我接到Alice街道那家住户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家收到了3个包裹。我赶忙开车过去，没想到，所有丢失的包裹都在同一天投递到她家里。失而复得的好消息，让我由衷地欣喜。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